

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及其政策探究

陆杰华 戚政烨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在“普职分流”的政策趋向下,我国高职教育愈来愈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在快速发展中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在高职教育的政策支持和大学生群体的消极认知差异。本文围绕“大学生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持普遍的消极态度,并在学历、家庭背景、高中类型、就业预期、城乡户籍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认知情况的内部差异则揭示出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遭遇的学历歧视、教育分层、生源分化和就业困境及城乡发展条件差异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为高职教育政策调整优化指明了方向。因此,本文建议从补充完善高职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优化高职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并完善高职教育招生和培养模式、强化高职教育人才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撑等方面助推现代高职教育体系建设,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 高职教育 认知态度 就业预期 就业困境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2019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办好新时代的职业教育。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

收稿日期:2023-02-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ZDA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老年学;

戚政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主要研究人口社会学。

次强调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释放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信号。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毋庸置疑，在上述系列政策文件中，反复提及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1]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普及、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在制度政策和发展实际中得到基本确立和发展，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2]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等层次人才、高级技术人员的教育环节进一步受到国家重视。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指示后，高职教育担负起了重要责任，通过“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3]

然而，在高职教育相关政策被普遍重视的同时，高职教育发展却并不乐观，尤其是社会大众对高职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知直接引发了学界的反思。有研究指出，“在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报考高职院校的比例都较低”^[4]，于是，入读学生的非自愿性和勉强性引申出我国高职教育的生源困境和发展方向问题。中国受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重理轻技”思想的影响，轻视、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5]普通本科大学在升学与分流中受到青睐。“多数人认为只有学习成绩不好或是家庭困难的孩子才去上高职院校，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愿报考高职院校。”^[6]社会对职业院校的认可度低是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各种偏见却使得职业院校及其培养的学生面临着难以得到社会认可的尴尬”^[7]。这些社会认知的语调有时也被称为具有“民间立场”，其独立性、渗透性、稳定性和内隐性的特征^[8]决定了它对于高职教育整体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一要素越来越受到相关研究领域的关注，研究的切面也不再仅限于对薄弱或偏颇的社会认知问题的发现与提出，而开始更加深入地分析其由来和作用。例如，有研究分析了民间立场的影响因素，认为高等教育政策、大学排行榜和传统文化这三个现实因素使得高职教育与“低层次”和“失利者”捆绑难分；^[9]也有研究认为，高职教育质量不高、对促进阶级流动作用不大等在内的社会系统的现实决定了社会认知的低潮^[10]。在这样的社会认知下，高职学生的“身份”与“认同”问题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有研究将这种障碍概括为来源于高职教育本体发展薄弱的先附身份认同属性不明确、制度配置和形象塑造下的结构性身份认同的错位以及主动层面的建构性身份认同的动力不足^[11]。这种“摇摆”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师生个体，更影响着高职院校本身的定位与发展。例如，有研究认为，“一些发展好的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寻思着怎么‘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而一些状况不佳的学校则在‘改名’上下工夫，力求甩掉‘职业’‘技术’这样的字眼，以求能够多招揽一些学生。”^[12]

从这样的研究脉络中发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认知问题已经侵入教育系统内部，在生

源、定位、认同和动力等方面阻滞了高职院校的发展，也违背了职业人才的培育和分流教育的初衷。于是，综合考虑这几方面的来源、表征和效应，本研究希望围绕着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展开讨论。其中包括高职院校和非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认知态度能够体现抉择和分流中的生源问题，而高职学生的前后认知还反映出当下高职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内生问题。除此之外，大学生群体的认知态度也能够较为清晰地折射出社会公众的总体认知氛围，总之，这是一个趋于全面的视角。在既往的研究领域中，有研究通过访谈的质性方法发现高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并不高，而这源于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职业教育本身发展的萎靡。^[13]除了面向高职教育学生外，一项对普通高校大学生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在校大学生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误解和偏见。^[14]可见，学界对高职教育社会认知的研究普遍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还是高职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程度和心态都偏于负面。当下，高职教育虽有政策的诸多支持，但在社会大众，尤其是在与之直接关联的大学生群体中遭遇漠视，这种认知可能会影响到在校初、高中继续升学的选择。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聚焦于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的研究相对匮乏和陈旧，如今大学生群体对于高职教育的真实看法、心态和抉择过程尚未得到清晰的梳理和呈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认知度状况仍然经常被模糊和总体性地概括。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先将聚焦于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与态度进行研究，下一步就职业教育的青年群体作进一步调研。

二、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及内部差异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以下简称PSCUS）。PSCU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智库主持实施，以全国范围内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为调查对象，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价值观与就业状况。2017年PSCUS调查针对985高校、211院校、普通本科、高职院校等17所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职校生和普校生开展分层抽样调查^①，共收集了13 981个大学生样本，样本数据具有良好代表性，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坚实的数据支撑。本研究基于当年PSCUS数据，整理和分析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及其内部差异，从中了解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困境，为破解高职教育发展困境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一）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总体认知与态度

认知和态度紧密关联但又相互区分，认知是行动者主观上对事物的信息加工和认识，而态度则是行动者基于认知而对事物的评价和行动倾向^[15]。本研究通过PSCUS调查中的“对高职教育的了解程度”和“是否认为高职教育受人尊重”相关问题回答情况，描述和总结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总体认知与态度。

① 包括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广州大学、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唐山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师范大学、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大学、上海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西北师范大学、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大学。

第一，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了解程度不高。此调查数据显示：有 39.6% 的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并不了解高职教育，仅有 41% 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对高职教育有一般了解。可见，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绝大多数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并未考虑和了解过高职院校。这使得高职教育的招生形势异常严峻，在分流节点上的学生们均对高职教育缺少足够且正确的认知。调查显示：正在就读于高职学校的大学生中，有 50.1% 的大学生在对高职教育仅有一般了解的情况下选择就读于高职学校，甚至有 12.1% 的高职学生在对高职教育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选择就读于高职学校。这说明当前高职教育的社会宣传还不够，社会公众对高职教育的认知不足，以至于大部分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是在没有充分了解高职教育的前提下选择就读高职院校。细究选择的原因，调查数据显示：有 41.2% 的高职学生是因为高考分数低而不得已选择高职，还有 6.6% 的高职学生选择高职学校是为了升本科以圆自己的大学梦，这都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把高职教育仍然作为“低层次”的备选项，是“失利者”的蜗居之地或是跃升跳板。

在非高职学生的大学生群体中，仍有 45.9% 不了解高职教育，有 40.4% 对高职教育仅有一般了解。这说明高职教育认知与普通教育仍然脱节严重，非高职学校的大学生在升入大学后对高职教育的了解仍然十分贫乏。在固有的刻板印象下，高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未被社会充分认识，^[16]不论是高职教育的普及情况差，还是高职院校学生升学选择的被动性，都反映出社会公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高职教育的不认同和不感兴趣。

第二，大学生对于就读于高职院校社会地位持消极态度。针对“是否认为高职教育受人尊重”的问题，在调查样本中，有 62.2% 的大学生认为就读高职学校的受尊重情况一般，另有 19.8% 的大学生认为就读高职学校并不受人尊重，仅有 15.4% 的大学生认为就读高职学校至少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可见，当下大学生在对高职教育认知不足的同时，还对其有着较为消极的评价。在这样的态度背景下，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教学水平和未来出路同样持较低的态度和评价，人们普遍认为高职教育的层次较低，给人提供的文化资本不够，且未来的就业地位低^[17]。因此，容易得出职业教育不如本科教育的结论^[18]，对高职教育的现实发展、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前景持消极态度。

这种态度的形成离不开以传统文化和社会氛围为主的外部原因。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由来已久，难以消除^[19]，受“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的影响^[20]以及中国自古以来重文学轻实业的传统教育理念等影响，文化教育在我国语境中天然优于职业教育。因此，在社会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够、职业教育发展尚未成熟之时，高职教育会长期地处于社会偏见和歧视之中。在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态度形成过程中，亲友认知的传递为这种刻板思想的内化提供了主要渠道。在调查样本中，有 45.1% 大学生的家人和朋友认为就读高职低人一等，这一现象直接指向了社会大众对高职教育的既成歧视与偏见，也提供了大学生不了解、不愿了解且不认同高职教育的外部解释因素。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与熏陶，对高职教育的偏见与排斥潜移默化地渗入大学生的思想。调查显示：有 35% 的大学生对其亲友的孩子报考高职院校的决定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另一项面向某省普通高校大学生的研究^[21]也表明，超九成普校生认为其孩子未来学业的第一选择应该是本科院校；而另一面向高职学生的研究表明，这些经历了高职教育的学生同样普遍地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不会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22]。这一不同代际的

观念不仅投射出社会传统观念的偏向，同时揭示出现实中高职教育的低层级面向，即人们认为各方面条件更差的学生才应该去高职院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下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和态度较为消极，而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存在认同感缺乏的问题。相比于当前政策的支撑，大学生的认知态度呈现出冷漠的特征，这一现象既来源于社会认知对于高职教育差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刻板印象和惯性思维，也归咎于高职教育本身薄弱的基础。高职教育无法正常运用政策红利而依然面对动力不足的问题，大学生乃至社会大众的消极认知便与高职教育的分化、生源、就业等症结环环相扣，因而这一认知现实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也是高职教育的发展取得进一步成效的一大关键。为了进一步厘清认知态度反映出的现实问题根源，本研究将关注蕴示着其内部结构与本质的内部差异，通过学历层次、家庭背景、高中和就业预期以及城乡户籍四个面向的维度，试图从大学生认知态度的角度概括出当前高职教育的现状、特征等问题。

（二）学历层次差异：文凭社会和学历歧视中的高职教育

由表 1 可见，调查样本中就读于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不尽相同。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对高职教育的评价与态度明显比高职生消极，这体现出当前高职教育确实存在于学历歧视的链条中，研究生和本科学员的学历层次被认为居于高职和专科之上，故而越高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对更低学历层次的教育类型的认知评价更低。

表 1 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认知态度差异（%）

学历层次	非常受尊重	受人尊重	一般	不太受人尊重	很不受尊重
高职	3.9	18.0	63.8	13.1	1.3
本科	1.8	13.6	60.9	21.9	1.8
研究生	1.6	14.9	63.0	19.2	1.3

根据图 1 显示，对自己期望最高学历越高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也越低。关于期望最高学历，调查数据显示，样本中有 29.8% 大学生的期望学历为本科，有 67.1% 的大学生的期望学历为硕博研究生，而仅有 3.1% 大学生的期望学历在大专及以下。因此，这样的数据构成首先就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教育的期望和需求都不满足于专科的层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职教育在文凭社会中不受大学生待见的事实。而期望最高学历与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之间的负相关趋势更揭示出当前教育与就业系统内文凭与学历的分级，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将高职教育默认为一种更加低级的高等教育层次。然而，普职的分流本身意在区分人才培养的模式、目标和输出方向，不同体系、同一层级的两种教育选择却在现实中被纳入同一体系而被分为高低级，这一现象不仅来源于人们的认知观念，更受到复杂的社会形态、劳动力市场、教育质量等因素影响。

于是，在大学生期望学历提升、劳动力市场中学历相对贬值的文凭社会中，高职教育被视为相对于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更为低级的学历层次而遭受偏见与歧视，高职教育在分流中趋向于分层底部，在各个方面都彻底沦为一个更低层级的高等教育类型。教育本就具有代际传递的鲜明特征，文化、经济资本的再生产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教育场景，也极大阻碍了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发挥和社会对多元人才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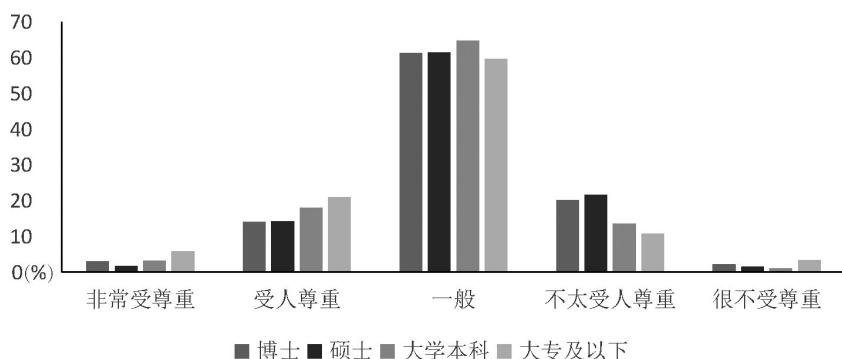


图1 期望最高学历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认知态度差异

(三) 家庭背景差异：普职分流之下的教育分层

如图2显示：大学生的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①，越偏向于认为就读于高职学校是不受尊重的，即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越消极。在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大学生对高职教育消极的认知态度通常源于父母对高职教育的评价和对就读于高职教育的态度，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一般而言越重视子代的教育质量并且会有越高的教育期望。高职教育在社会认知中并不算质量上乘的好教育。因此，会受到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的排斥。这直接导致高职教育常被认为是“更低一级”的高等教育层次，在高职院校招生、学生的自我和家庭学历期望等方面都吸引力不足。在当今家庭文化资本剧烈再生产、代际传递之时，大学生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的家庭文化差异表明，高职教育在发展中会遇到的更大的挑战，也警示当前高职教育的发展应回归自身情况、结合当前条件进行更具针对性地战略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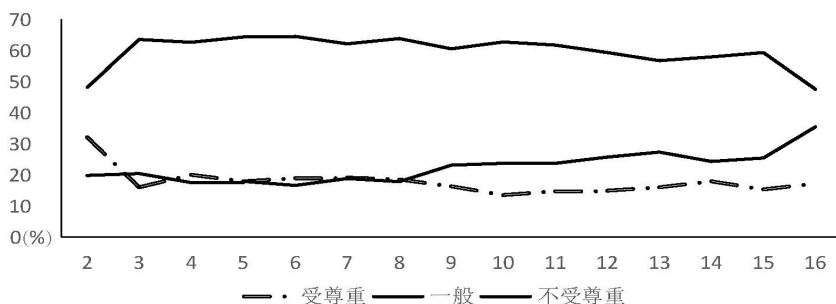


图2 父母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学生对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认知态度差异

根据图3可以得知：父母月收入水平越高（即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也越负面。这直接揭示出一种同时存在于观念和现实中的分层，即家

① 由于父母双方受教育水平的组合十分复杂，为综合考察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的影响，本研究设“父母受教育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指数”+“母亲受教育水平指数”，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指数各自计算，分别对应如下：1-未接受过正式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技校/职高/中专，6-高职/大学专科，7-本科，8-硕士/博士研究生。

庭条件好的学生更不会选择高职教育。有研究直接指出，高职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23]，既因为他们在经济、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受教育情况较差、教育期待较低，又因为他们本身就倾向于较早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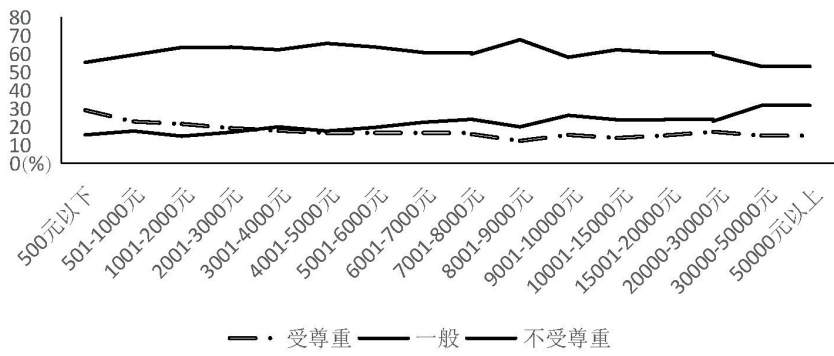


图3 父母月收入不同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认知态度差异

分流即分层的现实通过家庭文化、经济背景差异下的评价差异表明。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技术劳动的发展空间仍然受限，职业前景本身不够乐观，从而选择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缺少足够的吸引力；其次则在于人们对于教育分流和职业分层的刻板印象，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和高学历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从而在社会舆论中占据高位，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高的家庭为确保子女获得更高的未来效益、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宽容度降低，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客观现实。

（四）高中和就业预期差异：高职教育的生源和就业之困

如图4显示：调查样本中曾就读于重点高中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了解程度更低，且重点高中的层级越高，对高职教育的认知就越弱。这不仅对应了前文提到的期望问题以及教育分层的事实，还揭示出当前高职教育的招生困境：即使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得招生规模有所扩大，但其生源质量也难得到保障，分层的预言很容易在“生源论”中再次成为不可颠覆的现实。此外，大学生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的高中就读情况差异还折射出当前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还不够扎实，重点高中和好高中大都是普通教育学校，而教育类型的对接性很强，因此，若对普职的分层和歧视已在中等教育中成型，便很难在高等教育中力挽狂澜。因此，当前的教育政策正将“普职分流”向中招阶段引入，但中职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知面临着高职教育几乎同样的问题，高职教育的发展必然基于职业教育路径的整体性改善。

图5则反映出样本大学生对自己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税后月收入的期待越高，即可以认为其就业期待越高，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就越消极。这表明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越高期待的学生更不倾向于选择高职教育，导致高职教育的生源困境。这揭示出当下大学生甚至社会整体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普遍趋于消极的一个关键性原因，即高职学生的就业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调查数据，有近二成就读于高职学校的大学生认为，高级技工人员的工作较苦、较累，不如白领光鲜。在技术更迭速度加快、高职教育内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更替速度缓慢的背景下，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对传统产业专业学生的就业有较大的影响。总之，在当今社会中，知识型人才被置于人力资源金字塔结构布局的顶端，技术型人才位于中端，高职毕业生如果不愿意吃苦往往就只能面临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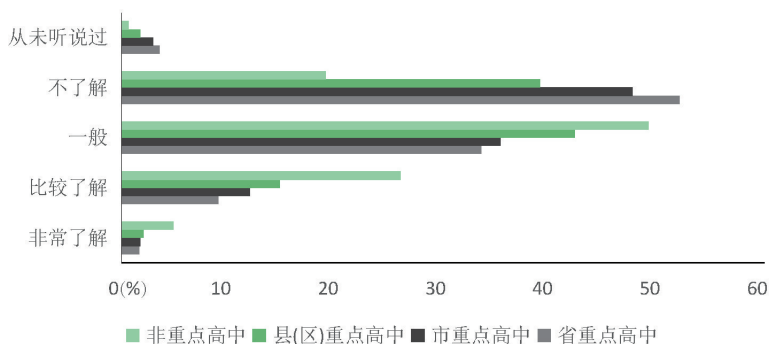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层级高中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了解程度差异

加上工人的工作风险较高和高职生的工资起薪较本科毕业生低，于是职业岗位的分化更加剧了社会对普职教育类型的偏见，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态度更趋于消极。当前高职教育和专科层次学历的毕业生总体上就业率较低，但部分专业和部分地区的高职毕业生却供不应求，反映出高职教育改革力度仍较绵软、高职教育与产业和市场需求对接不足、高职教育毕业生岗位适应能力和职业水平较低等问题，^[24]这些都是以上由于就业预期产生的对高职教育消极认知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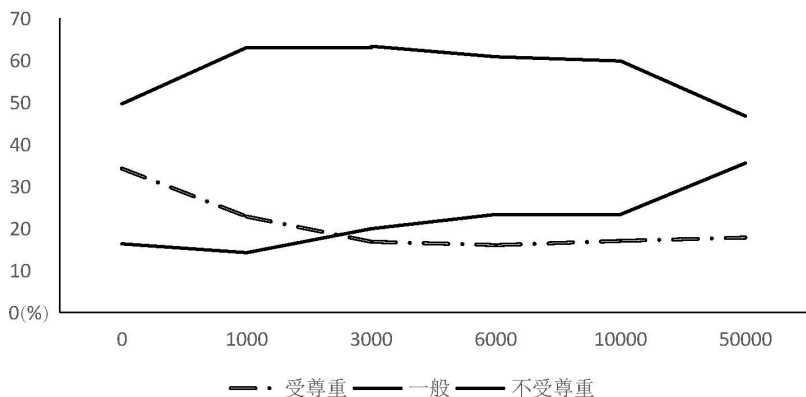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就业预期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社会地位的认知态度差异

在学历和行业的分层下，高职教育目前仍面临难以解决的质量短板，面临招生和就业的困境。优质生源不愿意报考高职院校、高考内容与职业教育的不适切、基础职业教育阶段没有有效培养和输送人才等都造成了高职教育的生源难题。而在大学生的社会认知中，高职学校的毕业生找工作更加不易、薪资待遇更低、前途更黯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现实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高职教育的生源困境和消极认知。

（五）城乡户籍差异：高职教育布局中的农村红利

农村户口和无户口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远高于城市户口大学生（见图6）。农村学生通常接受到的基础教育较差、拥有的资源较差，在高考中的竞争力不够。因此，对于许多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职业教育提供了门槛更低的高等教育机会。^[25]此外，城乡差异下，不同群体既成的职业期待使得高职教育在农村的建设与发展

更有现实基础，乡村振兴之下的产业转型和深化发展更加大了农村对技术性实用人才的需要，因而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等都能极大地促进包括农、林、牧、副、渔、水利、粮食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在内的涉农产业发展，对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与转型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乡村振兴之下的产业转型和深化发展加大了农村对技术性实用人才的需要。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欠发达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是最好的选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和家庭选择职业教育也更为理智^[26]，而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学生对高职教育有更高的接受度，以及高职教育与他们的人生发展更加适切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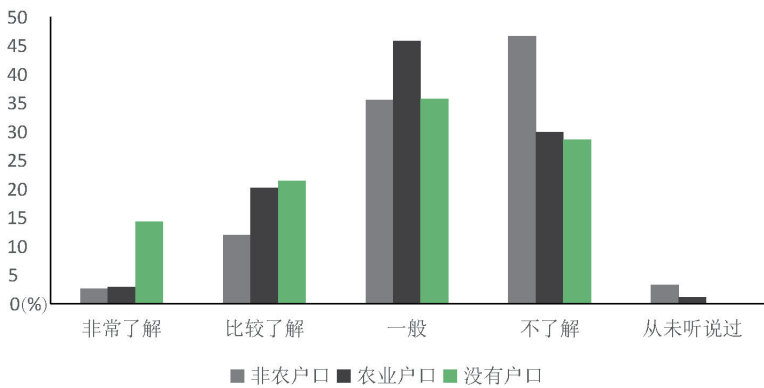


图6 不同城乡户籍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了解程度差异

这提示城乡户籍大学生对高职教育认知态度的不均匀分布，也凸显出高职教育城乡布局上的优势和劣势。农村相对于城市对高职教育有更宽容的接纳态度，对技术人才有强烈需求，因此有着更适合高职教育发展的现实条件。这种失衡的认知态度反而揭示出高职教育定位和布局调整的方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可见，农村的现实条件和认知氛围对于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时代性的红利。2011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意义重大，对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7] 优化高职教育发展路径，需要高度重视高职教育针对农村地区的战略布局。

三、相关政策讨论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的高级层次，肩负着为新时代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高级技术人才的重要使命。在普职分流、职业教育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得到政策支持高职教育却没有得到大学生群体的正向认知，高职教育依然面临发展难题，需要通过完善高职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优化高职教育资源配置、完善高职教育招生和培养模式、强化高职教育人才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撑等方面政策体系，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一，补充完善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相关法律与政策保障体系。1996 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基本框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但缺少更加细化和具备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使得高职教育的法律效力低下从而缺少支撑其发展的硬性动力。因此，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还应进一步制定和颁布针对高职教育的专门法，对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开展模式、运行机制、保障政策等进行详尽的法律规范，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基本依据和指导，提升社会大众选择高职教育的信心。

第二，强化对高职教育发展的系统化资源投入。由于高职教育面临严重的学历歧视，这一歧视本质来源于高职教育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劣势，而教学质量、硬件设施、专业出路等方面的短板，都可以归因于当前对高职教育的资源投入不足。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资源分配的劣势地位，而高职院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也存在严重失衡，这就导致高职院校的办学质量普遍低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差距也较大。要解决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一方面是要强调政策立场的主导作用和学者立场的中介作用^[28]，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加大对高职教育资源投入支持力度，不断调整自身定位^[29]；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纳入外部资源，引导办学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命运共同体”^[30]，尤其是利用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并做好校企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激励政策完善工作。

第三，改革完善高职教育的招生制度。正在实施的普职分流为高职教育的招生奠定了基础，而为了更好地贯彻普职分流，确保基础职业教育为高职教育培养和输送足够的人才，应强化对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支持。当前高考政策积极支持高职教育的扩招，但在追求扩大招生规模基础上，高职院校的招生和考试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当前高考招录制度中，高职院校的招生批次被设为最末批次，这使得高职教育的招生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目前，已有部分高职院校尝试单独招生，相关的政策支持也开始形成。在此基础上，社会还要进一步淡化高考是唯一升学道路、普通本科是唯一前途希望的观念，畅通多样性升学渠道。此外，要打通当前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衔接渠道，这使得本就位于观念上风的普通高等教育成为拥有更多机会和选择空间的“兼容者”，而选择高职便意味着失去一部分选择机会。因此，在鼓励和扩招“专升本”的同时，要进一步打通高职和本科间的合作与互通，推进高职和本科生、研究生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体系，^[31]通过消解当前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的割裂与分化问题，以淡化人们观念认知上对于高职教育的偏见。

第四，引导高职院校顺应环境变化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高职教育面临的学生就业问题，引发人们思考教育与产业对接环节的相关政策。当前高职教育滞后于技术迭代和企业需求，常出现“企业抢不到人、学生就不了业”的双难情况。因此，要大力强调政策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办学等办学模式，以此尝试解决相关问题。为了转变高职生不如本科生的社会观念，可以考虑实施加强社会宣传、提高技能岗位从业者薪资待遇、淡化学历取向的准入机制、建立和完善劳动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举措。此外，还应当专注建设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和培养模式，形成自觉化的学科建制，^[32]建立高职教育横向的分类培养机制与多线程平行培养目标^[33]，使得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真正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使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道路更加通畅。

第五，强化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农业户口的学生相较于城市

户口的学生更青睐高职教育，而农村发展也确实更需要人才，农村具有十分适合高职教育发展的观念氛围和社会环境，尤其在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34]，高职院校需要调整自身定位，培养更多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新型人才。高职教育应当进一步注重在农村招生，向农村输出人才，与农村产业化企业合作，甚至应逐步将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纳入高职教育体系，将农村作为其人才输送的重点方向。此外，高职教育作为培养技术人才和实业人才的应用型教育，课程体系应与乡村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为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一线人才。强化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思想引领，引导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理念，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总之，本研究所整理和分析的大学生对高职教育的认知态度差异性反映出社会现象及其差异带来的根源性困境，提出这一教育体系发展中所面临的、需要接受抑或克服的认知态度。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针对高职教育的发展应利用好社会认知特征差异所凸显的生源特征，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把握高职教育整体发展走向，调整高职教育的定位和发展路径，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 [2]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 [4] 徐金寿 赵 凌：《招生问题：高职教育发展的窘境与出路》，载《教育探索》，2011年第8期。
- [5] 王淑荣：《我国高职教育现状与改革思路》，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年第3期。
- [6] [20] [34] 陶红艳：《高职院校生源困境形成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载《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 [7] 周红霞：《消除偏见 引导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正确认识》，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年第31期。
- [8] [9] [28] 张应强：《高等教育质量民间立场与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载《江苏高教》，2021年第11期。
- [10] [33] 邹茜茜 余秀兰：《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平等发展的体系建设思考》，载《职教论坛》，2019年第11期。
- [11] [30] [31] [32] 张等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认同及生存立场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7期。
- [12] 周建波 闫志刚：《高职教育：身份“纠结”背后》，载《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1期。
- [13] [15] [18] [19] [22] [23] [25] 张志坚 史佳玲：《高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及态度研究》，载《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 [14] [17] [21] 张博闻：《普通高校大学生对职业教育认知的问卷调查报告》，载《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 [16] 苏宝芳 曹志清：《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载《教育探索》，2004年第8期。
- [24] 叶春生：《发展高职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3期。
- [26] 庄西真：《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调查与分析》，载《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年第5期。
- [27]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s7055/201110/t20111025_171559.html
- [29] 徐桂庭：《全国高职院校学生满意度调查研究》，载《职教论坛》，2020年第9期。

[责任编辑：陈树志]